

这个夏季,对于万科、王石来说相当不平静。随着宝能系“入侵”,万科股权争夺战愈演愈烈,王石也面临出局危险。近日虽然看上去出现了有利于王石的转机,但万科现在的管理团队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王石是万科公司创始人,也是一名知名的企业家,这个结果令人唏嘘。

那些被资本“赶走”的创始人人们

股权之争在资本市场里由来已久,资本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创业者与投资人也是博弈关系。创始人和投资者刚走到一起时可能是你依我依,但当资本方占领绝对优势地位时,如何处理与资本方的关系则成了创业者面前的首要课题。

有被资本蓄意驱逐的创始人,也有跟不上节奏的CEO,谁也不知道被投资方KO掉的创始人人们经历了怎么样的幕后故事,公众所知道的真相,往往流于表面现象……

红孩子 创始人被通知“下课”

事先没有任何征兆。2008年10月6日,红孩子创始人李阳被投资方之一凯鹏华盈派驻红孩子的代表金鹏开门见山地告知,董事会决定,让他立即离开这家由他创立的公司。

2004年6月,李阳和另外三位创业者成立红孩子,是以主要以邮购目录和电子商务为营销方式的母婴用品零售商,2008年销售收入曾达4亿元,是当年风头最劲的电子商务公司。

就在2008年,在转型面前,红孩子几位创始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是,风险投资方选择支持公司董事长兼CEO徐沛欣,主张让聚焦母婴用品市场的李阳出局。2008年10月,李阳和妻子王爽双双离开,套现了少量股权,对价是几百万元人民币。

公开资料显示,李阳离开红孩子后,与保险行业资深人士高纬共同创立保险代理公司——北京美日保险代理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2010年9月2日由美国中经合集团首轮注资。

而此后的红孩子则一度出现混乱局面。2012年9月25日,苏宁电器正式宣布以6600万美金收购,2013年4月红孩子并入苏宁易购大平台。据介绍,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苏宁红孩子开始掘金“二孩经济”,通过以“互联网+”,线上线下的同业合作、异业合作,实现与母婴健康成长有关的服务产业,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我的去留已经不重要

微信朋友圈谣言背后既有猎奇者也有利益链条

日前,一张照片刷屏了朋友圈,在照片中一位父亲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儿子走失的信息。当天有自媒体在朋友圈里称,孩子走失的信息是假的,也引发转发热潮。最后经过记者核实,男子丢孩子信息属实。谣言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而这些谣言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有的大有刷屏之势。对此,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胡正荣表示,要想遏制谣言的传播,除了专业媒体和政府部门及时辟谣之外,还需要积极主动地发布真实的信息,消解谣言传播的土壤。

谣言是如何产生的?其传播规律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传播学专家胡正荣。

雷士照明 创始人先后三次出局

2014年8月29日,雷士照明在香港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创始人吴长江被罢免。这是吴长江第三次被自己创立的雷士照明赶走。

1号店 悲情的于刚、刘峻岭

1号店,电子商务型网站,2008年7月11日,“1号店”正式上线,开创了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网上超市”的先河,由世界500强Dell前高管于刚和刘峻岭联合在上海张江高科园区创立。成立以来,1号店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2010年,1号店正处在电商转型升级的阶段,急需救命资金,深圳平安注入8000万元的资金取得80%的股权,但事后并未得到想象中的发展,平安开始寻求“接盘”的一方,沃尔玛加入。

2011年5月,沃尔玛开始入股1号店,占17.7%的股份,同时,大量沃尔玛高管入驻1号店。2012年,沃尔玛持股比例提高到51.3%,成为第一大股东。于刚等1号店管理层及员工的股份被稀释到只剩下11.8%。沃尔玛入股时,1号商城并未被纳入其中,而在2014年底,1号商城也低调回归。至此,1号店已经全部进入沃尔玛的控制体系。

2015年7月,于刚和刘峻岭决定离开。据悉,这是因为于刚和刘峻岭在公司融资时股权被稀释,最终失去控制权。沃尔玛则100%全资控股1号店。到了2015年9月,1号店离职人数已经突破千人,元老级员工已经尽数离开。

2016年6月,京东宣布,与沃尔玛达成深度合作。作为合作的一部分,沃尔玛旗下1号店将并入京东。消息宣布后,京东股价上涨近5%。

汽车之家 平安“入侵” 秦致出局

近日,随着平安信托与澳大利亚电信顺利完成汽车之家的股份交割,平安信托以16亿美元收购汽车之家47.4%的股权,正式成为汽车之家最大股东。据介绍,平安于10个多月前,开始与澳大利亚电信及汽车之家管理层多次友好接洽。

上个月,澳电将更新的股东名册交给平安信托,这意味着交割正式完成,平安信托成为汽车之家最大股东。澳大利亚电信并未对股权出售的原因进行具体说明,仅表示对于汽车之家的投资,到了获得回报的最佳时机。

面对平安信托的“入侵”,汽车之家管理团队耗时两个多月的股权之争最终以失败告终,随后汽车之家原有管理层也被清洗,CEO秦致被踢出局,原平安健康总经理陆敏成为新任CEO。在汽车之家,创始人、CEO手中股权过

济损失。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为了吸引眼球来吸粉,以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

有一部分谣言账号运营者通过转载、篡改热门新闻,不仅大大节约了成本和时间,还可以快速获得点击和转载量。谣言账号通过散布谣言新闻吸引粉丝数量,再将粉丝和访问量转化为广告费,当然有不少商家会选择粉丝数量多的微信账号,但并不关注这是什么样的账号。

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者潘晓路(化名)就是其中的获利者。“做微信公众号必须要吸引眼球,如果规矩矩做内容和标题,点击量、粉丝数都很难上去。”潘晓路告诉记者,他做的是一个养生、健身的公众号,原创的稿件非常多,基本上都



少一直是个硬伤。早在澳大利亚电信拿到汽车之家高占比股权时,这个“雷”就已经埋下。

有业内人士认为,与在国内上市的房地产巨头万科相比,汽车之家的股权斗争不如宝能“入侵”万科般充满曲折的剧情,这场战争更直接,有人评价“是一场赤裸裸的、纯粹的资本之战”。

■分析 股权之争是“资本的游戏”

其实,创始人与资本博弈的事件频频上演,因为和投资方的分歧,很多创始人不得不离开了自己“养大”的公司。

从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几起创始人与投资人的股权纷争可以看出,在成熟企业,创始人对公司有很强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又不仅仅体现在股权上。“由于他经营的年头比较久,不管是供应商、分厂厂长,还是管理层,更支持他,他具有一种事实上的控制权,他通过这种权力对抗投资人在股权层面上的管理权。这样也会导致争斗发生。”有分析人士认为。

以雷士照明吴长江为例,2012年,他与投资方闹翻,辞去公司职务,就凭借经销商的支持重新返回公司。这就导致创始人和投资人发生矛盾时,往往会上演剧情复杂、冲突激烈的“连续剧”。

国内一家知名券商的资深并购专家“无己无功”认为,万科王石与俏江南虽然表面上都是创始人与资本之间的冲突,但两者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是早年为了实现上市,“傍大树”主动交出控制权,后者也是发展过程中,为了引入发展资金,使得创始人的股权比例持续下降。如果说,当年王石是用股权换来上市可能,那么,类似俏江南等更多的案例则是用股权换来发展直接的资金。

但是,不管是王石也罢,还是俏江南张兰也罢,这些创始人或创始团队,在当初选择大比例出让公司股权时,就已经知道未来可能会发生现在的这一幕。

正如任志强所分析,资本是不分好坏的,在资本市场中没有阶级斗争的身份标记,什么资本都一样,分不出红与黑。资本的运作只有一个目标——盈利。当资本在寻求对收购对象进行控制并试图改变时,才有文化、追求、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导向和冲突问题。资本市场不能用道德去衡量与约束资本的行为。只能用公平的法律对待任何资本的行为。万科的股权之争,及资本与管理层的矛盾,也许是个案或特例。但反映出资本市场的残酷竞争,不一定会对企业的稳定发展带来机遇,反而可能带来的是灾难。

另外,有业内人士也表示,一些创始人为了追求资本,不得不稀释股权,最终失去控制权。股权被过度稀释无疑对于创始人或管理团队对企业的控制权会带来致命隐患。有很多企业存在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很多初创型企业,因为需要钱,需要输血,但是从来未来看,企业有足够的资本去发展是一件好事,但是股权不断被稀释,也会造成创始人或者其他灵魂人物失去对公司控制能力。“从感情上讲确实不好接受,虽然经营团队也依然熟悉,可从法律上来看,随着所有权的改变,公司创始人实际上失掉了控制权。”该业内人士称,面对资本时,不能一味屈服和依赖,而是应该从一开始就要提升自己的运营能力和造血能力。拿到融资是好事,但是不能一味地希望靠融资一步步走下去。

万科股权之争说法众多,对于王石本人有同情但也有反对。事实上,为了避免在公司控制权中出局,创始人在一些关键节点上是需要提前考虑的。

比如,在公司创建初期,创始人应该强化对公司的主导权。百度的最初股份中,李彦宏占了50%。腾讯在2000年引入IDG等投资时,马化腾及团队持股60%。在进行多轮股权融资时,创业经营团队的股权会被逐渐稀释。但是创始团队不能轻易放弃股权。

其次,有分析人士也明确建议,在进行股权结构设计时,不妨将股权和投票权分离。在我国,公司法不允许直接实施双重或三层股权结构,但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内对投票权进行特别约定,允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将自己的投票权授予其他股东代为行使。

再者,创始人对融资的节奏要把控好,保持公司资金正向流动,同时和公司估值平衡。“无己无功”在接受采访时也特别提到,有些公司在融资时,估值过高,后来因经营不好,无法达到约定目标,导致满盘皆输。

(据7月4日《半岛都市报》)

7月,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即将走向社会,在离别的喧闹声中,有这么一群人站在角落一直沉默,这是高校中不断增多的抑郁症患者,他们正经受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孤独与隔离。写完毕业论文,找份像样的工作,对此刻的他们来说,着实艰难。

北京一大学有40名学生被确诊患有抑郁症

部分单位通过心理测试拒绝抑郁症学生

调查 患抑郁症学生占咨询中心来访量的两成

“你好,这里是李家杰珍惜生命大学生心理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吗?”一段固定的开场白,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听筒那头迟疑了好几秒,缓缓地吐出:“你好,我想咨询下抑郁症相关的问题,已失眠3个月了……”当了3年接线员的学生志愿者小卿遇到这样声称自己有抑郁症的来电者,依然会紧张到手心冒汗。

“李家杰珍惜生命大学生心理热线”开通7年来,这条热线倾听到了全国各地近万人次的声音。热线主任秦琳告诉记者,每日在线的6小时会接到三四个学生的电波求助。另一所在京著名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负责人章文(化名)则说:“据粗略统计,5年前,10个咨询对象里平均一两个有抑郁症,而现在则上升到3-4个。”

目前,北京的高校一般设有心理健康中心,主要负责心理排查、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课和咨询等工作,学校还安排专职的心理教师,配备专门的咨询中心。这里,虽然不能像专业医院做临床诊断,却是预防危机和筛查抑郁的第一道“防线”。

在谈起遭遇心理危机的大学生群体时,长期在大学心理咨询一线工作的章文直言:“他们中患有抑郁症的占比较高,去年中心约有1500人次的来访量,抑郁症占到咨询人数的两成。经我们统计,全校共有40个学生确诊为抑郁症,算上实际患病却没来咨询的,这个数字应该还会更高。”

这些学生来时往往先聊“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跟导师(朋友)如何如何”、“我失恋了”等琐事,待完全放下戒备,他们才可能过渡到更深的话题:“总结差不多分四大类问题:学业、人际交往、家庭、人生意义追问。”关于学生的心理问题,每个学校的情况也不大一样,不同类型的高校,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艺术类大学偏重情感问题,而综合性重点大学则偏重于学业。”

抑郁症,作为一种心理疾病,从情绪、认知、动机和生理上都有明显异常的反应,判断是否得病通常在上述方面,“对生活失去兴趣,无意义感,严重的会出现自杀倾向。”章文记得曾接待一位历经3年半心理辅导的女生,这女该当时甚至记不住7个字以上的短句,“得了病,身心巨大痛苦,普通人往往难以理解,我们的流程是先询问症状,严重者建议转诊同时通知家属或老师,不严重者就心理咨询。”

“我不够好”,是中心来访学生口中出现的高频词。有悖于“学习好心理就好”惯常想法,成绩优秀的重点大学学生在抑郁群体中已经占有一定数量。他们对自己极其严苛,常流露出内疚和自责的情绪。“我接触到的好多孩子都聪明懂事,求胜动机很强的。长久以来压抑着自责或愤怒等情绪,这使得他们把攻击指向自身。”

特点 “病耻感”让在校学得病不易被察觉

曾是抑郁症重度患者的张腾坦承他接触过的不少同龄病友,他们在初期时往往不愿示人。公开统计显示,我国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至少是13万,而其中40%的自杀死亡者在自杀时患有抑郁症。

随机采访的学生普遍觉得抑郁症并不遥远,但对其基本知识和诊疗却不甚了了,多数者对他们的理解源于此前媒体的报道。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在去年末一次采访中谈到,当前中国抑郁症患者数量超过2600万。从北京市综合医院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中看:近10%的患者有抑郁,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过专科诊治。

由于心理问题有很大的隐蔽性,如果当事人回避,老师们也难以发现,高校对抑郁症学生的前期筛查难度可见一斑。面对这些困境,章文和秦琳都笑道,“来找我们的孩子都不大可能走极端。”她们觉得当务之急依然是“脱敏”,让学生和家长正视心理疾病,而非妖魔化。

(据7月4日《北京青年报》)

化抑郁症。“校园里患抑郁症的学生人数在逐年增多,但是有些同学甚至父母都会有病耻感,刻意避免交流,有的孩子到了重度,甚至拒绝看医生。”

硕士博士患抑郁症 呈升高趋势

北京高校心理素质教育研究会名誉会长兰桂瑞教授这些年来一直在进行“大学生心理危机群体”的调查研究。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她发现这些大学生抑郁症群体都有一些共性,例如:拥有不良家庭关系或亲子关系的学生占比比较高;研究生数量目前虽然占比不高,但已呈现出升高趋势。

相较于本科生,与小鱼相同遭遇的硕博们,面临着更多经济、学术或家庭的多重问题,他们承受的压力更大更复杂。章文回忆曾危机干预过一位男博士,当时这位博士1个月不洗澡。“读博6年却无法毕业。诱因就是论文和导师的冲击,他最终只能休学。”

小鱼的同学谈起她时,赞赏和羡慕着她的才华和勤奋,但觉得她姑娘逼自己太狠了,国外一年,小鱼曾在病中强撑翻译完一本600页的英文著作。小鱼导师很体谅弟子,劝小鱼不要心急,一切听医生的安排。小鱼说,“我生病,他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跟父母的心情是一样的。如果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出了问题,这对导师内心打击也会非常大。”

现行的大学管理体制,高校的心理教育对于研究生群体的覆盖率远不及本科生。针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关注度不够的话题,一位不愿姓名的高校心理咨询老师对此解释:“这种情况有一定客观原因,包含着高校机构设置的因素。一般而言,心理健康中心归属为高校的学工部,而学工部往往负责本科生的相关问题,对于研究生方面的工作属于协助性质。”

影响 部分用人单位会做入职心理测试

除了病耻感,随机采访的多名高校学生还提到不想去心理咨询的另一个隐情:“如果我这儿的心理出了问题,会不会让周围很多人知道,是否影响我未来的就业呢?”章文和秦琳的回答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学生们的顾虑,因为打心理热线和心理咨询绝对不会进入学生的个人档案。

“为他们保密,是我们的职业要求。除非这学生的情况已经很严重,有极端行为倾向,到那时,我们肯定会通知学校的辅导员以及家长。就这一点,我们会在咨询前跟来访者讲明的,征得同意,我们才开始我们的工作。”

记者注意到,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受到了校园用人单位的关注,入职心理测试也时髦起来。毕业生赵文(化名)今年春招时通过了一家事业单位的笔试与面试,体检环节时,单位要求她除了身体检查外还需去医院接受心理评估测试。在医院,赵文遇到了几个和她一样需要做心理健康评估测试的求职者,他们被要求填写一份心理测试题。这些题目涉及心理健康现状、个性特征、婚姻家庭、学业等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内容。

赵文事后才知道医生会根据问卷作出初步结论,判断被测试者目前的心理健康状况,推测测试者身体、工作、生活、家庭、学习等多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份问卷作答的真实性,有谁能保证?如果有人因为一份心理调查评估一直找不到工作,这算不算一种歧视和不公平?”

一位资深的心理评估专家表示,在入职时是否要心理测试,用人单位往往不同于求职者的态度,“48%的单位领导人认为招聘时应测试的心理健康比技能更重要。即使应聘者能力很强,如果心理方面存在问题,单位就会放弃。”但他承认确实有很多单位请他们为新入职者做心理健康评估,其中较多的是教育、医疗、安全等单位,不乏因心理测试不过关被拒绝的求职者。

(据7月4日《北京青年报》)